

## \* 學人介紹 \*

# 君子和而不同

## ——記熊十力與馬一浮的一次衝突

吳銘能\*

熊十力（1885—1968）與馬一浮（1883—1967）兩位先生都是近代儒家發展極為重要的學者，范兵曾將之與梁漱溟做比較研究，以為三人都是重建儒家心性之學的代表人物，並稱為新儒學三聖<sup>①</sup>，郭齊勇也認為「馬一浮、梁漱溟、熊十力先生及其弟子門生，構成了一個特殊的文化羣落，支撐著吾華道統，賡續著往聖絕學，孕育了現代儒學思潮」<sup>②</sup>，因此，熊、馬二位先生在近代儒學史上的地位是確立無疑的。他們雖然都談本體、心性與道統，但仍存有若干差異，而這些並不會影響他們彼此之間的相互欣賞，此正是所謂「君子和而不同」的極致表現。

馬一浮在 1939 年秋季主講四川復性書院，曾聘請熊十力前往講學，但為時甚短，僅持續不到兩個月，熊氏即拂袖而去，原因為何，熊氏的弟子及其友人在事後都沒有說清楚。頃近讀馬一浮書札，對於此事有諸多筆墨述及，今略為拈出，也許可以使後人瞭然於這一段插曲的始末。

馬一浮成名甚早，秉性耿介，由於「方外之慕，植自童年」的性格<sup>③</sup>，使他不喜逢迎往來。民國元年，教育總長蔡元培聘他任秘書長，到聘十餘日即辭職。以後蔡元培、馬敘倫、陳大齊等人以講學見招，馬一浮均一一拒絕，直至 1937 年才勉

---

\* 作者為北京大學古文獻學博士。

- ① 范兵：〈馬一浮與儒學文化體系的重建〉，《中國文化》，第 9 期（北京，1993 年 9 月），文中第 3 節。
- ② 郭齊勇：〈馬一浮的人格境界與哲理詩〉，《中國文化》，第 9 期（北京，1993 年 9 月）。
- ③ 馬一浮：〈自題舊稿〉，《馬一浮集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及浙江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，1996 年 12 月），第 3 冊。另〈示彌甥慰長、鏡涵〉，《馬一浮集》，第 2 冊，頁 178，文中亦有似此之言。

應竺可楨校長之請，講學於浙江大學。可見馬一浮不善與人接近之一斑。熊十力與馬一浮始相識於 1927 年<sup>④</sup>，起於熊主動致書馬一浮，對此，楊玉清曾回憶熊十力對他說的一段經過：

馬一浮清末就很有名聲。我既然住在杭州，當然想見見他。但是，找這個人介紹，不肯；找那個人介紹，拒絕。這些人的意思是說馬一浮誰也不見，他還見你！不得已，我自己寫了一封信並附著作，直接找馬一浮。很久，得不到消息，我就很氣。未必世界真有一個人，熊十力想見，他總不見的嗎？總於有一天，馬一浮來了。

我就說：我寫信給你，為什麼不回信？

馬說：你如果只有一封信，我就可以馬上回信，但你附有著作，我一定要把你的著作讀完之後才回信。你看，我現在不是來了嗎？<sup>⑤</sup>

自此以後，他們兩人成爲好友，在學問上迭有切磋問難，治學趨向與觀點雖有不同，但相互欣賞推崇，亦是學術史上一大佳話。如 1930 年，陳大齊欲敦聘馬一浮爲導師講學，馬婉拒，卻另推介好友熊十力前往，有「雖與浮持論未能盡同，浮自以爲弗如」的話<sup>⑥</sup>，可見其風度；1931 年 10 月，馬一浮爲熊十力《新唯識論》一書作序，既有推許，也有商榷<sup>⑦</sup>；又 1936 年 3 月在復學生雲頌天的信函，有「熊先生既久別，

④ 周開慶：〈懷熊十力先生——並述熊先生的思想概要〉，《鵝湖》，第 125 期（民國 74 年 11 月）。郭齊勇以爲熊、馬結識於 1932 年，而景海峯則以爲 1930 年熊「經原北大同事、時任浙江圖書館館長的單不庵介紹，與江南耆宿馬一浮先生相結識」，均誤也。郭說見郭齊勇：〈熊十力學行編年〉，《熊十力與中國傳統文化》（臺北：遠流出版公司，1990 年 6 月），頁 236；景說見景海峯：〈熊十力學行年表〉，《熊十力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民國 80 年 6 月初版），頁 293。

⑤ 楊玉清：〈關於熊十力〉，《名人紀念與回憶》（貴陽：貴州人民出版社，1994 年 8 月）。

⑥ 1930 年 12 月 28 日與陳大齊書，見《馬一浮集》，第 2 冊，頁 517。

⑦ 馬爲熊著《新唯識論》作序，熊表示極滿意，曾致書云：「序文妙在寫得不誣，能實指我現在的行位，我還是察識勝也。所以於流行處見得恰好，而流即凝，行即止，尙未實到此階位也。『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』，吾全部只是發明此旨。兄拈此作骨字以序此書，再無第二人能序得。漱溟真能契否，尙是問題也。」烏以風、丁敬涵編次《馬一浮先生語錄類編》師友篇亦云熊著送馬閱之經過，並有二人觀點異同：「以風嘗在先生座前推重熊子真先生，並以其新著《新唯識論》呈閱，先生深爲贊許。乃於 1929 年，至廣化寺往訪。二先生相見甚歡，並極論常變之理，熊先生主變，先生則主變中見常。」熊致馬書，收入《馬一浮集》，第 2 冊，頁 29。〈馬一浮先生語錄類編〉收入《馬一浮集》，第 3 冊，頁 1095。

舊時同遊諸子皆散而之四方，又各以事牽，未能一意進德修業」<sup>⑧</sup>，寂寥落落，溢於言表。以上均可見他們二人論學情誼之誠篤。

由材料顯示，馬一浮主持復性書院，原欲擬聘趙堯生講詩教，熊十力講哲學、葉左文講三禮<sup>⑨</sup>，而在草擬章程之際，馬一浮與熊十力雙方主張便大有不同。馬認為書院與現今新式大學及研究院不同，「書院之設，為專明吾國學術本原，使學者得自由研究，養成通儒，以深造自得為歸，譬之佛家之有教外別傳，應超然立於學制系統之外，不受任何制限」<sup>⑩</sup>。熊則以為書院若太過於「偏重向內，將致遺棄事物，同於寺僧，謂雖聖人復生，亦不能不采現行學校制，因有資格出路之議，不如此將不足以得人」<sup>⑪</sup>。有此理念不同，所以熊應西南聯大之聘而舍棄書院之決定，也就是很自然的選擇；可是，馬在得知消息之後，不勝悵惋，頹然若喪家之犬，在致熊之信中有「平生相知之深，莫如兄者，兄猶棄之，吾復何望」的話<sup>⑫</sup>，可以想見其內心之沮喪！但馬仍不死心，再竭誠力邀，曲盡其衷，動之以情<sup>⑬</sup>，有一番極為真摯的表白。他說：

弟以為教人若能由其誠，庶可使人能盡其才，雖成就千萬人亦不為多，即使只成就得一二人亦不為少，擴大到極處，亦絲毫無足矜異。兄意必期擴大而後乃肯至，以弟為安於狹隘，弟雖陋，或不自知其陷於狹隘，然謂自始即以狹隘為心，此言乃非知我。謂吾智小不可以謀大，力小不可以任重，弟當自承其短，若謂弟以狹隘之心量距人，兄此言或稍過矣。擴大之計，第一即要經濟條件，泥多佛大，水漲船高，俚語有之。弟既無福德，亦無神通，所謂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創議籌備諸人，對書院無認識，即對弟個人，亦何嘗有認識？弟不能強其認識也。未嘗不言，而輒置不報，尚可數數言之乎？故今日書院只是行權處變，不得已而應之。願力之弘，固在自心，人心之知與不知，不足為病，若因緣之廣，須得人助，未能取信，何由自然

⑧ 見《馬一浮集》，第2冊，頁806。

⑨ 1939年7月12日與葉左文書，見《馬一浮集》，第2冊，頁447。

⑩ 見馬一浮：〈書院之名稱旨趣及簡要辦法〉，《馬一浮集》，第2冊，頁1168。1939年8月10日致雲頌天書亦云「熊先生卻欲吾為學生定出路，吾以書院乃在現行學制系統之外，無權為此」，見《馬一浮集》，第2冊，頁811。

⑪ 1939年7月1日致熊十力書，見《馬一浮集》，第2冊，頁539。

⑫ 同前註。

⑬ 同前註。

而集，是不可以強也。〔……〕兄若因是而不來，則十餘年來以兄爲能相知，亦是弟之誤，兄猶如此，何況他人？弟從此亦將藏身杜口，不敢更言學問，更言交友矣。<sup>⑭</sup>

果然，熊得到老友這樣文詞並茂、推心置腹的書信，深爲所動，也就答應其請，並立即拍電表示願在舊曆六月十五日前即首途。馬得知之後，與先前情緒跌落谷底判若兩人，他是「爲之喜而不寐」<sup>⑮</sup>！

由於日軍侵略中國，對各地展開猛烈轟炸，東南半壁江山在一年之中相繼失守，民眾流離奔命，在炮火中遷徙。「自南都不守，不旬日而杭州亦陷，浮先徙桐廬，旋因寇逼富陽，再奔開化」<sup>⑯</sup>，1939年「入春輾轉來川」<sup>⑰</sup>。熊十力在7月24日由重慶搭船，溯長江而上，在宜賓換舟，由鄧子琴陪同，於8月上旬抵達樂山。

8月19日，在日軍轟炸之下，樂山全城燬燼，大半已爲焦土，幸書院同人俱各無恙，唯獨熊「住宅被焚，左足受傷」<sup>⑱</sup>。於是全體移住烏尤寺。復性書院也展期定9月17日開講。

然而，此項意外卻使熊在未開講前，即在9月上旬，萌起不如歸去的念頭！觀由馬一浮的復信，可知熊足傷因沒有受到周全的照料，內心頗爲不滿：

頃讀來示，不勝皇悚。書院事不待追論，皆由弟無福德智慧，不能取信於人，故令寒儉至此。然兄之來，自是爲學術、爲道義，與後生作饒益。不獨爲朋友之私，補弟之闕失而已也。不意遭此鉅變，弟不能慎防慮之道於事先，又不能盡調護之責於事後，咎無可辭，兄之見責，宜也。諸子事忙，遂或於承事之際有忽，此亦由弟思慮不周之故，向後兄有所需要，徑請直說，苟爲弟力所能及者，必當爲兄謀之〔原注：亦屬諸子善爲承事〕，但望兄切勿萌去志，勿再言去，使弟難爲心。尅實言之，今日無往而非危地，其又何擇邪？少閒即趨視，先此敬問痊安，不具。<sup>⑲</sup>

在馬委婉懇請之下，熊亦不再堅持，擬予留下。

<sup>⑭</sup> 1939年7月17日致熊十力書，見《馬一浮集》第2冊，頁543—544。

<sup>⑮</sup> 1939年7月20日致熊十力書，同前註，頁547。

<sup>⑯</sup> 1938年3月15日致謝無量書，同前註，頁360。

<sup>⑰</sup> 1939年8月4日致湯孝佶書，同前註，頁556。

<sup>⑱</sup> 1939年8月27日致屈映光書，同前註，頁674。

<sup>⑲</sup> 1939年9月9日致熊十力書，同前書，頁548。

可惜，在書院開講不久，熊卻憤而離去！到底爲了甚麼？殊不易索解。許多學者對熊離去原因，或深知而有所隱諱，或不知其詳而略筆帶過，如錢穆云「不知何故，齟齬離去」<sup>⑳</sup>，程兆熊云「後因故退居」<sup>㉑</sup>，郭齊勇云「在復性書院用人的問題上，馬、熊鬧過彆扭」<sup>㉒</sup>，景海峯云「因與馬一浮相處不和，離開復性書院」，「主要是辦學方針和用人兩個方面的問題」<sup>㉓</sup>，錢氏與程氏皆未說出原因，可不予考慮，倒是郭氏與景氏皆一致以爲「用人方面」是原因之一，筆者嘗試覆案馬一浮書札，確有討論用人的線索：

(一)、1939年7月17日，馬有信回復熊，提及不延聘張真如講黑格爾、周滄卿講英文及牟宗三爲都講，其理由爲「蹄涔之水易竭，不能供養十方羅漢僧侶，且書院力不能購西方參考書，學生並未注重外國文字，使聽黑格爾哲學，亦毫無憑藉，無受教之資，則講者必乏興」。如此解釋，熊及賀昌羣極表不滿，以狹隘斥之<sup>㉔</sup>。

(二)、同年9月30日，提及聘任黃離明事，馬以爲「彼此僅一面，並未深談，遽下聘函，未免太驟，俟稍往復相契，乃以爲言，未爲晚也」，而關於聘梁漱溟事，則以「俟其到渝，當具書邀之」。

馬一浮與熊十力對書院創設理念不同，前已述及，因此在用人方面勢必有所選擇，況且馬對聘任人選標準極高，固然熊爲馬所敬仰之僚友，對於熊所薦舉之材未必全數如願，如前述之人選，就可見資料顯示，僅有梁漱溟列入聘任<sup>㉕</sup>，其餘一概不取。

<sup>⑳</sup> 原見錢穆：《師友雜憶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民國72年），頁201，轉引自余英時：《猶記風吹水上鱗——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民國80年10月），頁63。

<sup>㉑</sup> 程兆熊：〈番山洞與來鳳驛之聚——紀念熊十力先生百年誕辰〉，《鵝湖》，第125期（民國74年11月）。文中對此事輕描淡寫略過，且有云「馬先生從來未代人書寫，此乃平生第一次」，恐有誇大語，其實馬先生未輕易代人書，但對於至交親友，他是不會吝惜筆墨的，如爲熊十力寫〈熊氏叢書弁言〉、代南通張季直寫〈湯塾先生家傳〉、代蔡元培寫〈湯石泉先生家傳〉、代湯壽潛寫〈浙軍凱旋紀念碑銘并序〉及〈烈士徐君墓表〉等皆是。詳見《馬一浮集》，第2冊。

<sup>㉒</sup> 見郭齊勇：《熊十力與中國傳統文化》，頁24。

<sup>㉓</sup> 見景海峯：《熊十力》，頁300-301。

<sup>㉔</sup> 馬言經濟條件不足固是實情，但因教育理念的不同，馬本無意聘講西方哲學之人才，此處言「蹄涔之水易竭」云云，應是推諉之詞。此信見《馬一浮集》，第2冊，頁542-546。

<sup>㉕</sup> 在1939年10月15日，馬修書邀梁漱溟前往講學，是時梁在成都，正如9月30日致熊書云「俟其到渝，當具書邀之」，可見熊所推薦人選，僅梁爲馬所接受。此信見《馬一浮集》，第2冊，頁703。

其實，辦學理念與用人是一體的，在熊未答應至樂山講學前，即與馬對辦學理念的不同而有所論辯，孰知熊在馬誠摯力邀下前往，既已許諾，卻並未真正放棄一己的見解。由上述二信可知熊、馬觀念之爭執並沒有因熊受聘而消解！雙方內心的芥蒂是存在的。

果然，在九月下旬，即書院開講不久，熊對馬有微詞，馬以郭某「其人言談氣貌一無足取，心惡其妄，遂未與言」，引起熊的不悅指責，以為「所以待郭某者未得其道」<sup>②⑥</sup>。在十月初，雙方的爭執達到高潮：

書院既不能驟謀改革，兄言已盡，去就之道決於改革與否，此意難迴。今只能維持現狀，弟亦無詞以留兄，姑俟百閔來時，當可就兄與昌羣商量。弟既無能為役，一切章制可聽籌委會修改，兄行似不須如是其亟也。相見無詞，何貴僕僕造謁，虛作周旋，但望兄遲遲其行耳。至與兄相愛之厚，未嘗有改，決不因持論小有不同，而遽有介於胸也。草草不能宣意，臨穎黯然。<sup>②⑦</sup>

熊既堅決離去，馬亦飛書急告劉百閔前來共商書院大計，但遠水救不了近火，約在10月中旬，熊斷然而行，留下無可挽回的遺憾<sup>②⑧</sup>！熊後並退聘書及百元薪俸。

熊之離去，似乎在理念及用人的差異所致，然深層分析，熊之性格不能說與此無關。由馬答熊之書函，即可透視個中消息：

12月1日來書，乃知獲罪於兄者甚大。凡兄所以見詬者，皆弟之疏愚所不及察，是固由弟不德有以致之，初不料朋友之道至於如此，人之相與，其難乎為信也！兄被災之後，弟未能盡調護之力，此過前已自承，至兄誤聽流言，以為弟於兄有所訾議，使兄不能不亟去，此則弟所萬萬想不到者〔原注：上堂教學生善聽兄言，初不知此語亦成罪戾，真是轉喉觸譚矣〕。睽之上九曰「見豕負塗，載鬼一車，先張之弧，後脫之弧」，兄之多疑，無乃有似於此，

②⑥ 《馬一浮集》第2冊，頁548—548，1939年9月30日與熊十力書。

②⑦ 同前註，頁549，1939年10月9日與熊十力書。

②⑧ 劉百閔、陳立夫、屈映光、壽毅成等人均為書院籌建董事會委員，馬一浮對於熊十力的去留，曾有多封書信寄往劉百閔處勸駕前來共商，惜熊離去，劉等仍未能至樂山，直至11月中旬以後劉方抵樂山、而熊則在10月17日之前已離去。見10月26日馬致劉書云「十力不樂留嘉，頃已徙居璧山，留之不可，不能無憾」。及10月17日致蒙文通書云「子真先生因災後時苦警報頻煩，不樂住嘉，現已暫往璧山」之語，可知10月17日熊已不在樂山復性書院，而往璧山了，至於對蒙文通言熊「苦警報頻煩」之說詞，因蒙非書院籌委會成員，無須據實以告，此處乃隱飾之，不可據以為真。以上二書俱見同前註，頁588及頁705。

今亦不須申辯，久之兄當有自悟之時。然念兄雜毒入心，弟之誠不足以格之，亦深引以為戚。<sup>②9</sup>

熊「多疑」及「雜毒入心」，應是如林宰平所說的「平生未有變化氣質之功」<sup>③0</sup>。錢穆對馬、熊二人之印象，也可以印證這樣的看法：

一浮衣冠整肅，望之儼然。而言談間，則名士風流，有六朝人氣息。十力則起居無尺度，言談無繩檢。一飲一膳，亦惟己所嗜以獨進為快。同席感不適亦不顧。然言談議論，則必以聖賢為歸。就其成就論，一浮擅書法，能詩，十力絕不近此。十力晚年論儒，論六經，縱恣其意之所至。一浮視之，轉為拘謹矣。但兩人居西湖，相得甚深。殆以當年，兩人內心同感寂寞，故若所語無不合。及在復性書院，相從講學者逾百人，於是各抒己見，乃若所同不勝其所異，睽違終不能免。<sup>③1</sup>

這段回憶，除了「相從講學者逾百人」有誤之外<sup>③2</sup>，應是值得採信的<sup>③3</sup>。

經過這次巨大衝突，熊、馬二人交誼是否即惡化至不可收拾呢？1949年，共軍已打下全國大片江山，國軍潰敗已成定局，熊在廣州，馬寫了「寄懷熊十力廣州」一詩，說明了答案：

<sup>②9</sup> 同前註，頁550—551，1939年12月7日致熊十力書。

<sup>③0</sup> 這是熊十力自承林宰平對他的評語。見熊十力：《十力語要初續》（臺北：樂天出版社，民國71年10月初版），頁18。

<sup>③1</sup> 同註<sup>②0</sup>。

<sup>③2</sup> 在馬一浮給所有親朋師友的信札，言及學生人數不超過三十人，最多僅有二十餘名，此言「相從講學者逾百人」，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。

<sup>③3</sup> 張起鈞：〈熊十力卓然不羣〉一文記載熊之脾氣怪且不合理：

在北平時，與某教授同住一院。一天他在屋內獨自踱來踱去，那位教授搭訕著說「熊先生，您寂寞不寂寞」，這原是表示好感的話，他立刻罵起來了，「寂寞！人不能耐寂寞，那禽獸不如」，請問這從那裏說起呢？

他上課在家裏上，他的課在課上只有一堂，可是他愛上多久，就多久；並且多半是從下午一點鐘，一講就講到天黑。不要說不許你走，眼睛若往旁處看一眼，就立刻招來臭罵一頓，有時他還動手打，毫無理由的打。〔……〕

翟志成研究熊十力有年，亦以為熊「為人既驕且吝，好名好勝而又目空四海，時時貪、痴、嗔之毒習氣橫發而又不知自檢。閒中雖亦偶會天機誘發而無限慚惶，但最終卻僅止於『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』之域」。張文見張起鈞：《儒林逸話》（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民國71年12月），頁44—45；翟文見翟志成：〈熊十力在廣州〉，《當代新儒家史論》（臺北：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，民國82年5月），頁11。

自廢玄言久不庭，每因多難惜人靈。  
西湖別後花光減，南國春來海氣腥。  
半夜雷驚三日雨，微波風漾一池萍。  
眼前雲物須臾變，唯有孤山晚更青。<sup>③④</sup>

在一個國共政府拼死決活、天翻地覆的國度裏，「眼前景物須臾變」，人命處不可逆料之中，同僚即使有不同見解而爭執，但畢竟是可資談話的對象，馬一浮這首詩反映了大時代患難中的真情，誰說不是「君子和而不同」的縮影？

1997年10月9日初稿

10月14日修定

<sup>③④</sup> 見《馬一浮集》，第3冊，頁500。